

GONGHEGUO NIANLUN · 1953

共和国年轮书系



共和国年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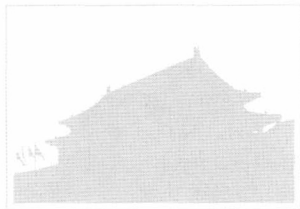
1953

林蕴晖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GONGHEGUO NIANLUN · 1953

共和国年轮书系



共和国年轮

1953

林蕴晖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年轮. 1953/林蕴晖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9

(共和国年轮书系)

ISBN 7-202-02855-7

I. 共… II. 林…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1953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288 号

书 名 共和国年轮·1953

著 者 林蕴晖

责任编辑 马千海 李剑霞 张励锋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王雅丽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4000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2855-7/D·32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郑 惠

这是一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书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半个多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是,中国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却超过了此前几千年。这段中国历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大概没有人不承认,毋须赘言。

但是,如何写这“短短的一瞬”的历史,特别是如何写好这段历史,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同中国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实际上是同步的。学术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的划分一直有不同看法,但实际上两者很难截然划分开来,在研究中往往是交叉重叠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像中共党史一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真正写好十分不易。我以为,关键还在于应当具备一种

历史理性。

什么是历史理性？如果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解释这个概念，而是具体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话，龚育之同志的一个意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提出十条指导思想，其中第一条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什么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龚育之同志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遵循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就是遵循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的指导。……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这里说的是写党史，但是同样适用于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国史也要站在党的立场和站在科学的立场。我以为这就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理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党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真实是历史学的灵魂所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因此，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是历史理性的基础。尊重党的决议和党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则是这种科学立场在党史、国史研究方面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探求客观真理。所谓党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这样理解而作另外的解释，只能是对党性的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既有辉煌，也有曲折，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写历史应当如实地写两个方面；偏废哪一个方面，都是对党性和科学性的背离，都是缺乏历史理性，都写不出真实的有价值的历史。

《共和国年轮书系》的作者们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写作的。这部书系分别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年份的历

史。以某一年份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不是首创。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一部写得相当成功的这种史学著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但是以年份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而且形成一部书系,确实还不多见。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年份的历史的确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比如1949年、1956年、1966年、1978年、1992年。通过描述这样一些年份的历史,挖掘其中的历史内涵,透视其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不失为研究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这部书系的作者大都是党史、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素有积累,写作这部书系也算是“厚积薄发”。至于书系所达到的学术水准、社会效果,最终还得由广大读者来评说了。

书系出版前作者嘱我写几句话,简单写了上面这些文字,是为序。

2001年7月



引子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①是1951年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1952年是“三年准备”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早在这年的6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到，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了以后说“你们不像战争的国家，打了一年多的战争，还是一片和平空气”^②，这正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和“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成功反映。是年8月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1951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195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就明确宣布，1952年的财政预算是第一个财政收支平衡年度。收支平衡、经济恢复、物价稳定，标志着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已经提前完成了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国家整个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② 周恩来1952年6月19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

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在同月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毛泽东也说：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①

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主要是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建设。为了集中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国家的重点项目，国家不得不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计划调度。而这与依赖市场发展的农民个体小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不发生矛盾。在“五反”运动中揭露出不法资本家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恶后，更引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于是在1952年6月断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胡绳在一部文稿上批道：这话虽然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判断，但已趋向于把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要任务提上了现实的日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当年秋天开始酝酿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因此，1953年，既是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也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年。

^①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3页。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一五”计划第一年 / 1

与苏联谈判援助 / 3

优先发展重工业 / 15

各行各业的支援 / 19

鞍钢三大工程竣工 / 23

周恩来总结经验 / 27

第二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 / 31

面临新的情况 / 33

毛泽东的“过桥”说 / 38

对私营工业的调查 / 42

中央政治局的决策 / 45

总路线的基本思路 / 46

马恩理论与苏联模式 / 49

第三章 新税制引起风波 / 59

修正税制的出台 / 61

各地风波骤起 / 63

批判“公私一律” / 66

四十年后话旧事 / 71

第四章 大小“仁政”之争 / 79

毛泽东说“仁政” / 81

所谓“九天九地” / 83

梁毛公开冲突 / 87

梁漱溟闭门思过 / 93

第五章 高岗大闹财经会议 / 99

正在上升的“明星” / 101

高岗的最初试探 / 105

毛泽东批“右倾” / 117

财经会议发难 / 120

组工会议“呼应” / 129

图谋“第二把交椅” / 137

高岗喊“冤” / 140

第六章 农业互助合作 / 147

组建中央农工部 / 149

坚持稳步前进 / 151

邓子恢的政策思想 / 161

陈云肩挑“炸药” / 167

互助合作方针的改变 / 181

第七章 资本家接受总路线 / 193

和平改造的方针 / 195

向工商界宣传总路线 / 201

资本家心态种种 / 211

改造全面启动 / 217

第八章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 231

板门店重开谈判 / 233

战俘遣返达成协议 / 244

停战前的最后一仗 / 252

板门店签字仪式 / 257

志愿军光荣凯旋 / 266

第九章 政治文化全面建设 / 273

召开人大的建议 / 275

加强统战工作 / 284

教育科学卫生 / 292

结束语 / 307

1953年大事记 / 319

参考书目 / 327

第一章

“一五”计划第一年



1953年是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由苏联政府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是“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工程。陈云在80年代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与苏联谈判援助

斯大林向周恩来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

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国，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终于从1953年1月1日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启动了。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1951年开始着手。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为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具体工作由中财委计划局负责。由于当时对全国基本经济状况的了解还很不够，对经济恢复的速度也还缺少把握，朝鲜战争将持续多久尚难预测，因此，这次编制工作，只是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进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中财委加紧了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7月，提出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

告提纲》两个文件完稿。这三个文件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工厂。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这个轮廓草案，可以作为向苏联征求意见和向苏方提出援助的基本依据。8月15日，周恩来率领由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以王鹤寿、陈郁、宋劭文等为顾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同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等问题。在8月20日和9月3日同苏方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军队整编等情况，对中国五年建设计划的方针和基本任务作了说明。斯大林说：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说，我们对中国的援助，不仅技术上是头等的，而且价格是便宜的。他还说，你们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应当是飞机、汽车、军舰都能制造；你们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做计划时，应留有余地，要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要有后备，不要造成五年还完成不了计划指标。他认为，在五年计划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不留后备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这样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他建议，中国每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以百分之十五为好。^① 9月22日，周恩来和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回国，李富春等留在莫斯科就苏联援助的建设项目逐个进行磋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58页。



李富春在莫斯科七个月与苏方商谈大致经过是：

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首先将中财委编制的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有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七个五年发展计划材料交给苏方并作说明，请苏方提出意见。经双方商谈决定，9月和10月由苏方有关部、局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要求苏方援助的项目，以及中方提供的有关地质等资料，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则分头到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从11月起，苏方有关部门分别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交换意见，提出哪些项目需要建，哪些可暂时缓建，以及哪些项目苏方能够承担，哪些项目无力承担，双方展开研究和讨论。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小组会谈，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沙布罗夫和李富春主持，会谈涉及中国五年计划的全盘内容，重点是“一五”计划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和铁路的发展规模。苏联国家计委还成立包括李富春、苏方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总顾问等的五人中心小组，负责审查中国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苏方认为中国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工人和干部指标等都过高，恐怕完成不了，必须相应地降低，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煤矿、石油、电力的产量，机器制造、兵工等工业的设计、工厂扩建改建规模、资料平衡、厂址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鉴于苏方要求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包括各工业现状、资源、平衡、干部与技工、进口技术等)，以论证具体项目的可行性，李富春于1953年1月7日致电陈云、薄一波，要求在1月18日以前补送硫磺及硫化铁、石灰石、工业盐、磷、钾五种

原料的资源(在什么地区)与数量,阿莫尼亚、硝酸、硫酸、烧碱、纯碱五种产品五年平衡材料,现在坦克修理厂的全部资料,铁路五年计划新修各线的坡度、弯度、桥梁负荷、机车牵引吨数、旧车与新建线路号志情况与计划,五年分类的技术人员平衡表等十三种资料。

2月1日晚,沙布罗夫约李富春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方国家计委各副主席、各有关工业局局长到会。沙布罗夫首先说明,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不好。他说: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够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现在提两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沙布罗夫还提出:你们地质资料很不健全,设计工作落后,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不足,是你们五年计划中的薄弱环节。李富春对这三个问题,详细作了说明和解释。沙布罗夫重申,你们提的五年计划速度是快了一点,有可能受挫折,中国党和人民都会感到很痛心。把地质资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暂缓,这样中国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他建议用两三天时间,再分组审查一次。李富春认为沙布罗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表示完全同意。^①

李富春与沙布罗夫商谈结束后,同宋劭文、叶季壮进行了研究,并与驻苏大使张闻天统一认识,一致认为,沙布罗夫总的意见是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

^① 1953年2月3日李富春给周恩来、陈云的电报。